

■ 声 音

C刊问题与「破五唯」的真正落实

□ 黄力之

应,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从而,也导致了一种“版面垄断”现象。当C刊高度集中在双一流高校当中时,双一流高校仅仅在高等院校中占5%的比例,而双一流高校发表C刊的论文数量却占比高达68%。

从刊物的角度说,C刊为了提高影响因子和学术影响力,倾向于发表知名学者的论文,以此来提升期刊的整体声誉。大约有50%的核心期刊通过约稿来维持其地位和高质量标准。2021年6月,一家大学学报的主编发表文章透露,该刊专家约稿量占该刊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一时引发热议。

换一句话说,学术界这个需方与C刊这个供方的供需矛盾,远远大于正常的比例。而且,在学术界这个需方中,青年人的处境尤其困难。C刊发表的“贫富差距”巨大无比。

因此,各种建议在提出。比如,60岁以上长学者自觉让出对C刊发表市场的占有,给青年人一条生路;年长学者想写文章,可以到非C刊去发表,也可以自己开公号发表,无非是有话要说,在哪里说无所谓;年长学者还可以多出书,少写文章,既可以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又不占据青年人的学术地盘;硬性规定C刊一年内必须发表多少青年学者的论文,强制压缩年长学者的论文等等。

对于60岁以上的年长学者来说,理论上已经或者正在退出江湖,已无升级评职称的压力,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看重区区一C刊呢?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蜗名角利之事已充斥大半辈子,何必一定要弄到底呢?不与年轻人争食,也算是美德吧。应该提倡此种境界。

但在实际上,60岁以上的年长学者依然是大学的宝贵财富,这块奶酪并不好动。

对于这一问题,从刊物角度如何看?

作为C刊,培养年轻学者自然是责无旁贷之事。如果有一个机制保障发表更多的青年学者的文章,为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发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刊物总归是要考虑自己的学术形象的,不同刊物之间存在客观的竞争,优秀文章发得多了,会比优秀文章发得少的要更有学术形象和学术地位,这是客观规律。学术史的众多事实证明,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年龄与阅历对学养是有支撑力的,而自然科学似乎更与必要知识和超强思维能力有密切关系。比如,杨振宁在35岁时、李政道在31岁时一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便是证明。但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而言,30多岁可能还处在积累期。

如此,人为减少年长学者的文章,对于人文社科类刊物,恐怕不是一个好选择。只是,青年学者的生存问题又是无解的了。

对此,有何解决之道?

在我看来,问题之解在于破除学术刊物的等级设计。现在,入选C刊目录,对刊物是一种“官方认定”。甚至在这些期刊中,还要区分出顶级、权威、核心、扩展等不同的级别。这一等级,各个大学的领导机构、学术机构都承认。在重要刊物的论文发表数量,再加上课题数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排名。这样,刊物优先考虑的是不能被C刊目录除名,而学校优先考虑的是要有更多的C刊文章,因此,当然要支持年长学者贡献论文,培养青年学者便成为无解之难题。

其实,当前的教育评价改革有着很好的思路,就是“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真正实行就有了破解之道。既然“唯论文”都可以破,为什么一个论文的人为等级就那么难破呢?只是既得利益决定不能破而已。

简单的办法是,从制度上破除论文(及其发表阵地)的人为等级,实行代表作制度——申请人提交代表作,对其发表阵地不设置门槛——无论发表在何处甚至未发表均可,由外单位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果真如此,作者和刊物之优劣都可以解除,除非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同行专家的德行和水平。

可否试点起来呢?这是对“破五唯”的真正落实。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某某学术大佬“霸榜”各大学术期刊的新闻。于是,上C刊难,特别是青年学者发表难的话题动辄被人们重新提起。

首先来看,中国C刊这个供方有多大市场?

刊物本应是需求方,它需要学者供给文章,但它现在成了发表的供给方。

根据最新的CSSCI(2023-2024)来源期刊目录,CSSCI来源期刊共有660本,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共有249本。因此,总共有909本CSSCI相关期刊。此外,还有175本CSSCI来源集刊。

根据最新的数据检索显示,2023年的C刊发表论文数量为69141篇,也就是7万篇左右。

其次,学术界这个需方有多大需求?

以2023年为例,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数量达15.33万人。毕业的应届生为75.2万人,再加上延期毕业的人数,总毕业人数超过8万人。发表2至4篇C刊论文,可毕业一个博士。理论上讲,大约需要16万篇C刊论文。这还不包括高校老师,但已经远远超出C刊所承载的7万篇的刊载数量。

再放大一下,中国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人口规模为社科活动人员总数与博士毕业生人数及在校博士生人数之和,接近10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百万人有发C刊的需求。硕博士想要读博,发一篇C刊可以增加录取率;博士毕业通常是硬性要求,高校老师评职称时,C刊是必须的选项。大学非升即走的评价体系大多会通过C刊来衡量。

那么,C刊的实际发表状态是怎样的?

C刊的版面目前主要由少数的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占据,这容易生成一种马太效

本报讯(记者 许婉霓) 5月10日至11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视频致辞。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刘醒龙,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秘书长古新功,湖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锐,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文学院院长王平,以及百余名家学者与会研讨。

邱华栋在视频致辞中谈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先驱,“可训”在花甲之年开始小说创作,以文学研究反哺其小说创作,将文体意识转化为文本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小说流淌着江汉平原的气息,既有方言叙事的特色,也有民间叙事的现代转化,宏大叙事与小人物书写相融合,有超越地域叙事的独特性。“从三尺讲台到虚构江湖,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赤子之心,是一位文学精神的摆渡人。”

“可训”迄今已创作小说超百万字,出版《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娴》《渔人故事集》等多部小说集。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可训”小说创作中的中国经验与本土资源、文体意识与艺术风格、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等展开探讨,并深入分析近年来文学批评家从事文学创作这一现象。大家表示,“可训”的小说注重民俗风情描写,继承了古典笔记小说传奇性、寓言性等特色,体现出民间艺术蓬勃的生命力,传递出普通人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八方文讯

专家研讨钟求是近年小说创作

5月17日,由浙江省作协主办,江南杂志社、平阳县宣传部承办的“宇宙里的昆城——钟求是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温州平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与会者谈到,钟求是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时代性,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世界性的文学主题。他的作品在平实的故事中蕴含着空灵感和超越性,从坚实的土地出发,寻找小说起飞的瞬间,在普通架构中挖掘不普通的东西。他对故乡的书写和记录形成了内化的“昆城”,刻画了时代浪潮冲击下城中人行为与观念的变迁,将现实的故乡和精神的故乡融为一体。

“故乡不仅是我写作的出发地,也是我的文学根据地。”钟求是表示,希望通过创作成为故乡平阳注入更多的文学元素。

(刘鹏波)

42部剧目将亮相中国儿童戏剧节

5月16日,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 塑造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4日至8月17日在北京举办。

■ 理论探索

文艺“人民性”的传统与新变

□ 相 宜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始终以“人民性”为精神主轴,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构筑起独特的价值谱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到“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桎梏,从改革开放后“二为”方向的重构,直至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体系化确立,我们始终将“人民性”置于核心场域,既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底色与发展战略,又在每个历史转折点上完成价值内核的迭代更新。当下,在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人民性”正被注入多维度的时代意蕴——既延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传统,又拓展出全媒体时代的交互性审美范式。从人民文艺的传统,到新时代由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等跨媒介、跨文化综合发展出的新大众文艺,更广泛的人民大众参与到文艺创作与传播的全过程中,激发着新的文艺生态产生。

一以贯之的文艺“人民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学为媒介,开启了“人”的觉醒之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左翼文艺思潮迅速形成思想洪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瞿秋白、鲁迅、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作家、评论家围绕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核心命题展开持续讨论。当时不仅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论,更以方言创作、民间叙事等实践,在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审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左翼文艺运动随着革命进程深入延安根据地,其理论架构在解放区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针对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做出了调整与拓展。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涉及文艺人民性的核心问题。由此,他鲜明地指出文艺的人民大众立场问题,阐明“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来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从此,解放区文艺与文化建设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指导思想。

在“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一方针指导下,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生活、学习群众文艺,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纳入到文艺创作之中。秧歌剧、信天游、剪纸等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与原来的文人创作融合起来。文艺家们走出象牙塔,在田间地头收集创作素材,刻画群众火热的生活场景,并与人民自发性的文艺创作相呼应。延安时期,“人民文艺”观念的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方向的确立,直接引领并激发了人民文艺实践的蓬勃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成为最紧迫的文艺主题。为了更好地向农民、工人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奋起抗战的重要性,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被灵活运用,传统民间艺术形式转化为革命宣传的利器。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进一步成为历史舞台和文艺舞台的主角。由此,新文学也进一步向人民文艺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艺术家以多彩的笔墨记录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以及各条战线

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得以收集、整理,并在专业作家和普通大众的创作中得到重新激活。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中国文艺界注入新活力。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文艺工作者们纷纷拿起笔,将冻僵的笔尖重新浸入生活的熔炉,书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走向。这场始于1978年的文艺觉醒思潮,以“伤痕文学”揭开历史伤疤,借“反思文学”解剖时代阵痛,用“改革文学”记录转型魄力,在“寻根文学”的深掘中触碰民族文化基因,在“先锋文学”的叙事迷宫中探索人性深度……整个八十年代犹如沸腾的试验场。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在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中,找寻文艺记录时代现实、反映人民心声的新空间。各种文艺思潮相互激荡,共同推动“人民文艺”在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中,不断吸取新鲜养分,拓展出新的表达体系。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是文艺作品的评判者等角度,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更全面的阐述,推动了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一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加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展开丰富的文艺创造,全面深刻地展现时代生活的巨变与人民精神与情感的革新。与此同时,在教育普及和技术赋能的背景下,人民大众广泛地参与到文艺创作与传播的进程之中,涌现出了蔚为大观的“新大众文艺”。这是文艺“人民性”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新变。

文艺“人民性”的多维呈现

文艺的“人民性”似乎随着时代语境不断演变,但其中暗含着多个恒定的思维维度。新时代的创作者们,正是在这些恒定的维度上,结合新的现实语境,不断探索创作的广阔空间。

作家艺术家们聚焦于“写人民”,以人民为作品的主角。古典时代的叙事,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英雄侠客为主角。五四以来,作家艺术家将更多的视野转移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来。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进一步打破传统文艺的“精英叙事”,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表达的焦点,使得创作视角更加向平民化转向,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照亮时代变革与现实生活。例如,2021年的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的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完成易地搬迁,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剧中马德福在漫天黄沙中带着大家架设扬水站、说服村民吊庄移民的身影,正是千千万万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2022年电视剧《人世间》的热播则展现了文学与影视的深层共振。该剧改编自梁晓声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人世间》

的成功源于作者对工人日记、社区档案等真实素材的深度挖掘,以“个体经验”打捞“集体记忆”。作品讲述了平凡中国人的人间事,以周家三兄妹半个世纪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串联起北方城市的社区生活,展现了宏阔时代的波澜壮阔与人生的悲欢离合,塑造出生机勃勃的劳动者、建设者、改革者、创业者等人群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民写”,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创作的主体。如果我们追溯文学艺术的源头,它就来源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的感叹与记录。当先民在狩猎后围着火堆击节而歌,用粗糙的石刀在洞穴壁上刻画猎物的轮廓时,文学艺术便以最本真的形态诞生了。此后,各式各样的民歌、民间舞蹈与绘画等,绵延不断地发展开来。因此,“人民写”并不是一件多么新鲜的事情。现在,“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构成一个显眼的现象,是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赋能,越来越多的普通主动地加入创作的队伍,而且他们与专业作家之间的差距和界限不断消除。在文学界,最鲜明的体现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不断涌现。“我手写我心”,基层劳动者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素材,从“被书写者”向“创作者”转变,同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手段实现创新,将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文艺现场。外员王计兵的诗歌诞生于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间隙中,从《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爆火,到近日诗集《低处飞行》的出版,他已累计创作诗歌6000余首。在广东东莞,在宁夏西海固,一大批素人写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用朴实的文字书写烟火人生,彰显文学的新活力。

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无论是“写人民”,还是“人民写”,出来的作品最终都需要经过人民的评价和检验。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往往能够获得当时广泛受众的喜爱,甚至获得不同时代接受者的推崇。在新的媒介语境下,很多作品诞生于网络平台,在众多读者的催更与交互之中完成,实现了“读者即编辑”的交互式创作。一些作品还被多番“二次创作”,在算法的推荐下成为热门的作品。这体现了当下文艺从单向传播到多维共创的全民化转移。当前的文艺创作,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比如,由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延伸出一大批的小说、诗歌、舞剧等作品。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核均来源于东方美学悠然山水的传统之美,由传统画卷生长出来的壮丽山河的意象,深植于人民的审美传统之中。二是借助科技、媒介,让文艺更加可触可感,更加融入人们的生活。《黑神话:悟空》采用虚幻引擎5技术,结合中国传统榫卯结构的数字化建模,打造出云雾缭绕的花果山、神秘诡谲的地府等场景,将东方水墨的美学融入游戏沉浸式体验,进而推动了古建筑原型地的文旅热潮。《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AI动作捕捉技术,将敦煌壁画动态渲染与角色动作结合,使传统艺术焕发新生。还有很多的文艺展览,凭借新媒介、高科技的多元形式,打通声光舞美,甚至触觉体验,使大众身临其境,处于动态的文化之美当中。借助传统的艺术元素、崭新的媒介手段,创作者们积极探索表达现实核心议题的新路径。这些新的探索,让文艺以更加多样的形式与人们的生活贴得更近了。

总之,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人民”是起点,也是归处。新的人民文艺正以新的媒介、新的姿态、新的形式记录属于这个时代的现实图景,释放出独特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者发出邀约,来塘口共建共治共享文明社群。此前不久,江门市委宣传部已联合广东省网络作协和开平市在塘口启动“侨乡新大众文艺社”建设项目,并举办广东网络文学(江门塘口)青创孵化中心共建签约仪式。

今年以来,江门以优越的创作环境和扶持政策,邀请“无界创客”汇聚于此,以侨乡文化为纽带、以数字创新为驱动,构建“人才—产业—文化”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新模式,让“原乡人、新乡人、归乡人、旅乡人”共谋发展,共助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和发展。下一步,塘口镇还将联动网络文学孵化中心、影视拍摄基地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人才生态,让“IE公社”真正成为乡村数字经济的活力引擎。

(刘鹏波)

《打风》勾勒港岛人生风暴

5月17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中篇小说集《打风》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阿乙、宋嵩、侯磊、能尖日等作家、评论家,及该书作者、香港文学作家程皎阳,责编宋辰辰与会,围绕这部聚焦香港都市生活的小说集展开交流分享。

小说集《打风》中的每篇小说都聚焦职场人的生存困境。“打风”是广东方言,意为“台风”。程皎阳表示,香港的八号风球(台风预警)是她创作的重要意象。她笔下的角色总在风暴中挣扎,在“打风”的浪潮中奋力前行。

与会者谈到,作为“90后”新锐作家,程皎阳的小说聚焦都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奋斗精神,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职场、人生隐喻与香港社会的多元面貌交织在一起,构建出独特的文学质感。

(王泓桦)

塘口“IE公社”助推新大众文艺

5月15日,广东江门在开平塘口镇启动了“IE公社”建设,向全国“数字游民”和创意工作

傅崇活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选刊》杂志社原副主编傅崇活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傅崇活,笔名傅活,中共党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选(1984—1989)》《中篇小说选(1984—1989)》《小说十八品》《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1993—1996)》等。